

往事如昨

二十六封信

张凤英

前几天我翻腾一个旧书箱,那箱子跟了我快四十年了,木头边角都磨得发亮。翻开盖子,一股陈年的纸墨味儿扑上来,底下整整齐齐码着一沓信,用红塑料绳捆着。我解开绳子,数了数,一共二十六封,全是孙老师写给我的。旁边还有一小捆,是我当年写给他的回信,那是孙老师去世以后,师母专门寄回来的。

我今年七十有三了,眼睛花了,得凑到窗户底下才看得清那些蓝黑钢笔字。一封一封读过去,孙老师的笔迹从早年的刚劲有力,慢慢变得有些颤抖,最后几封信,字都歪歪扭扭的,像秋风里的树叶。读着读着,眼眶就热了。我对自己说,这回得写一篇像样的文章,好好怀念一下孙老师。

那是一九七三年,我十八岁,从内蒙古大草原跑到厦门大学读书,念的是计统专业。全班数我年纪小,同学们都把我当小妹妹看,孙老师是班主任,四十多岁,中等个儿,戴一副黑框眼镜,说话慢悠悠的,带着点东北口音。他看我年纪小,离家又远,平时就格外多照看我几分。

我真正觉得孙老师把我当女儿看,是因为冰激凌。那时候厦门满大街都是卖冰棍的,三分钱一根,白糖水冻的,咬一口嘎嘣脆。可冰激凌金贵,奶制品紧张,得凭票供应,师母在食品厂上班,偶尔能分到一小盒。每次分到了,孙老师就打发他女儿,比我小几岁的一个圆脸姑娘,噤噤跑下楼,在我们女生宿舍门口喊:“张凤英姐姐,我爸叫你去家里一趟!”我头一回听见,还以为班里出啥事了,急急忙忙跑上去。推开门,孙老师坐在藤椅里,面前小桌上摆着一只白瓷碗,碗里是淡黄色的冰激凌,已经开始化了,碗边沁出一圈水珠。他笑咪咪地指指椅子:“坐,赶紧吃,别让它化了。”我端着碗,拿小勺舀了一口,又甜又凉,奶味儿浓得化不开。我嘴里说着谢谢,鼻子却有点酸。孙老师就那么看着我吃,眼角挤出一堆细细的皱纹,那眼神,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。父亲还在世的时候,领着我下馆子吃羊肉泡馍,也是这么个眼神,好像我吃得香,比他自己吃还高兴。从那以后,我心里有啥悄悄话,都愿意跟孙老师说。有时候是功课上的难处,有时候是想家了,有时候就是女孩子那点说不出口的小心思。孙老师从不嫌烦,听完了,总说一句:“慢慢来,不急。”

毕业分配那会儿,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,觉得年轻人就该去最艰

苦的地方。我跟孙老师说:“我想去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。”他没接我的话茬,摘下眼镜擦了擦,慢悠悠地问:“你调查研究过哪里最需要你吗?”我一愣,摇摇头。他又说:“你们是化工部委托培养的,人家出了钱供你们读书,你说走就走?要我说,你就写‘服从祖国分配’。”我立刻就明白了,老师是在点我,做人得讲信用,得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。于是,我就在志愿表上规规矩矩写了那六个字。

后来,我分到了河南伏牛山里的一处胶片厂。那地方真是山沟沟,进厂得先坐火车到洛阳,再换长途汽车颠四五个钟头,一路上全是盘山道,窗外悬崖峭壁。工厂是保密的,连个正式名字都不让对外说。可我一点儿没觉得苦,反倒挺踏实,就是有一件事揪心——厂子年年亏损,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我心里急,就给孙老师写了封信,把厂里的生产、销售、库存那些事儿唠唠叨叨说了一堆。孙老师回信写了好几页纸,他原来在省计委干过,懂经济,给我出了不少主意,特别提到“投入产出法”,说你们几个厦大毕业的,别把学的本事荒废了,凑一块儿琢磨琢磨。

我一看信,赶紧联系同在厂里的几个同学——一个在计划科的、一个在财务处的、一个在销售处的,还有一个在人事科。我们五个找了个星期天,躲在单身宿舍里,把厂里的账算了一整天。后来,我们鼓足勇气,在生产调度会上提了一套扭亏方案,从调整产品结构到开拓南方市场,一条一条说得明明白白。厂长听了半信半疑,但也没别的办法,就让我们试试。那一年,全厂上下真拼了,技术人员吃住在车间,销售员拎着样品跑遍了大半个中国,年底一算账,竟然真的扭亏为盈了。庆功会上,厂长点名表扬我们几个大学生,我坐在底下,心里第一个想的就是孙老师。当晚我就给他写了信,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孙老师回信只有短短几行,但我能看出他很高兴,因为那个“好”字的最后一笔,拖得老长。

在厂里待了几年,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小伙子。他是技术员,不爱说话,但干活认真。恋爱那会儿,我心里没底,又写信给孙老师。孙老师回信问得细,对方什么家庭出身,脾气怎么样,工作上有没有上进心,对父母孝不孝顺。他在信里写:“婚姻是人生大事,既要志同道合,也要彼此包容。你性子急,他若是个性子慢,未必是坏事,刚好互补。”我看了忍不住笑,孙老师真是把我琢磨透了。我们结婚

时,孙老师寄来一封信,附带着一对英雄钢笔,笔杆上刻着“百年好合”四个小字。那对钢笔,我现在还收在抽屉里,虽然早就不用了,但隔段时间就拿出来擦擦灰。

后来我怀孕了,头一胎,啥也不懂,又慌又喜,照例写信问老师。孙老师的回信里说:“教育孩子,以身作则比说教管用。耐心比权威重要一百倍。”这话我记了一辈子。我两个孩子,从小没挨过打,犯了错我就蹲下来跟他们平视着说话,效果比板着脸训斥好得多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调到了烟台的一所高校教书。第一次站讲台的前一夜,我紧张得睡不着,爬起来给孙老师写了封信,问怎么才能当个好老师。孙老师的回信我至今能背出来:“教书育人,重在用心。知识可以传授,但品格需要熏陶。你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。”那封信的信纸已经泛黄了,折痕处都快断了,可墨迹还是蓝黑蓝黑的,像昨天才写的。

孙老师退休以后,有一年带着师母专程来烟台看我。那时候他头发全白了,背也弯了些,但精神很好。我们坐在我家阳台上,泡了一壶铁观音,海风吹过来,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海,说:“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水。”我给他讲我这些年的经历,讲我上课怎么把枯燥的统计课讲得有趣,讲学生给我起的外号。他听着,时不时点头,最后说:“看着你成长,是我教书生涯里最欣慰的事。”夕阳正好照在他的脸上,那一刻,我恍惚又回到了厦门的那个下午,他看着我吃冰激凌的样子。

孙老师晚年,我隔三岔五打电话过去。他耳朵有点背了,我得大声喊,可他每次都要问我的工作、我的孩子、我的身体,最后永远是一句:“注意身体,别太累。”他去世前一个月,我收到他最后一封信,字迹歪得厉害,信很短:“人生短暂,要活得有价值。你做得很好,我放心了。”那是我收到的最短的一封信,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封信。

孙老师这一辈子,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二十六封信,加上一辈子没断过的牵挂,这些在我看来是无价的。我在讲台上站了二十五年,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。每当我对着台下年轻的面孔,我就会想起孙老师看我的眼神。教育是什么?就是一颗心暖着另一颗心,一个魂儿叫醒另一个魂儿。等哪天我到那边见着孙老师了,我可以挺起胸脯跟他说:“老师,您教我的,我都传下去了。我没给您丢脸。”

烟台故事

失而复得的《宁海州志》

于建章

宁海州,是今牟平区的古称。当地最早的一部州志,为明嘉靖二十七年宁海州同知焦希程所编撰。可到清代后期,世人普遍认为这部州志从未刊刻流传。同治年间编修的《重修宁海州志》记载,焦希程“稿甫成而去”——志稿刚刚写完,他便调任离开,书稿没能刻板付印。

然而,当地资料亦有记载:乾隆年间牟平诗人宋克智、道光年间牟平史志奠基人宫卜万,都亲眼见过这部书,还在诗文、志书里留下记载。在他们之后,《宁海州志》便杳无踪迹。同治三年(1864)舒孔安、王厚阶修志时,已经寻访不到此书;1936年,于清泮重修《牟平县志》,遍查官府卷宗、走访民间藏家,甚至远赴济南图书馆搜寻,依旧一无所获。从清末、民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,学界形成定论:焦希程的《宁海州志》未曾刊印,仅有稿本,历经百年战火、水患、霉变,连稿本也早已消失。

转机发生在1981年。山东省启动新一轮地方志编纂,牟平县志办公室随之成立。省志委下发《地方史志存书目录》供各地查阅交流,其中一条记载让县志办人员眼前一亮——《宁海州志》,焦希程撰,明刊本,藏浙江宁波天一阁。

众人惊喜之余,又满心疑虑。天一阁是江南著名藏书楼,这部牟平本地失传数百年的古籍,竟然远藏宁波,实在难以置信。更矛盾的是,历代牟平旧志都说此书没有刊刻,天一阁却标注为明刊本。还有人提出疑问:浙江恰好有个宁海县,会不会是书目混淆,把浙江《宁海县志》误写成山东《宁海州志》?但撰者“焦希程”三字确凿无疑——他正是明代宁海州同知,修的就是牟平的州志。为什么此书存世数量稀少?专家考证推测,可能此书当时印数不多,流传未广,后世的人,见其书者更少。

县志办工作人员大喜过望,即刻派人赴浙江寻访,盼这部故土旧志能够“完璧归赵”。天一阁作为古籍保护单位,原版古籍不能移交,只同意提供影印。可原书年代久远,纸张朽脆,难以直接上机影印。前去交涉的工作人员便连续三天三夜,不眠不休,一字不落地手抄全书,之后再据抄本影印。珍贵的明刻本,至今仍保存在宁波天一阁。

四百多年前的州志,以抄本的形式重回牟平故土,是当地文史界一件盛事,县志同仁无不振奋。消息很快传到台湾的牟平同乡会。1995年8月,同乡会名誉会长苗育秀先生,委托台湾中兴大学校长、同乡会理事长解宏宾博士,在台湾再次影印此书,使之两岸流传,永久保存。

牟平当地领导与文史专家高度重视这部失而复得的古籍,研读中发现,此书所载典章制度和当代差异巨大,文本存在不少讹误,再加上古字僻词繁多,阅读门槛很高。为扫除阅读障碍,充分发挥这部古志的史料价值,牟平区政协与烟台史志专家杨墨老先生商议,由他对《宁海州志》做系统考证与注解疏释。由此,1997年《焦志疏考》问世,让这部沉寂四百余年的明代州志,得以被今人读懂、研究。